

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与 空间结构的演变

陈建军

(浙江大学 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由此引起了长三角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浙江和上海之间发生的产业区域转移以及由此导致的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演变,揭示了时间序列下上海和浙江之间存在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正是这种区域间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的存在,推动了长三角制造业产业重心的迁移,进而在长三角内部形成相对合理的产业空间结构和产业分工结构,并使得以上海为地标的中国经济的中心区域扩展到了整个长三角地区。

[关键词] 长三角; 产业转移; 空间结构; 雁行形态

[中图分类号] F127.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7)02-0088-11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and Spatial Structur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HEN Jianjun

(Research Center for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The major impetuses of factor movements and industry shifting in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Delta Region have caused changes in spatial structure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promoted economic integration. First of all, through analyzing the frames of new spatial economics, an industry shifting theory of "Flying Geese Pattern" is worked out. A theoretical frame of "Concentration-dispersing" with industry shifting as major impetuses is set up and is used to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shifting and spatial structures. Secondly, based on the related theory of competition advantage in regional industry, the appraisal model of industry shifting is established and used to carry out quantitative appraisal o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25 two-digit code industries in Shanghai and Zhejiang in the two typical years of 1990 and 2004. It reveals the objective path of the central shif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and spatial structures in the region. Thirdly, based on the devolvement course of industry shifting an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dynamic variety in average income per capita from 1980 to 2003, it is defined that a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a

[收稿日期] 2006103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3BJL010)

[作者简介] 陈建军(1955),男,四川蓬安人,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发展和亚洲经济发展。

typical "Concentration dispersing" evolution duration with industry as a carrier and Shanghai as a center. In the 1980th, the main "Center Periphery" system covers "Shanghai peripheries of Shanghai + peripher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 Century, the main "Center periphery" system is developed, cover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 Peripher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industry shifting; spatial structure; the Flying Geese Pattern

一、问题的提出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要素的跨区域流动。这种要素流动,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主要是产业区域转移。在国际上,产业区域转移常常是以发达国家或地区对后发国家或地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美国、日本和亚洲 NIES,以及美国、日本和东盟之间,产业区域转移也基本遵循这样的形式。但是在长三角内部,人们似乎看不见这样以区域间的直接投资,特别是“先发地区”对“后发地区”的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产业区域转移。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浦东的开发与开放,上海的经济地位又一次被凸现出来,在中央给予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的鼓励下,不仅有大量的外资进入上海浦东地区,而且周边江浙地区的不少民间资本也进入上海。于是在有关上海的经济地位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关系问题上,相关的学者以及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者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区域和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或者“经济中心”正处在成长过程中,其表现在于不断地吸收国际资源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增长极”没有错,但是这个“增长极”不是指行政区划领域内的上海,而是指“上海经济圈”或者“大上海地区”,即长三角地区。而在长三角内部之间,上海和周边的江浙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关系,已经不是“中心”和“外围”的关系,而是同为“中心”的相邻区域之间的一种互相融合和渗透的关系^[1]。这种跨区域的要素流动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但是如何证明这种观点成立,关键在于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厘清上海和周边地区之间的产业集聚与扩散,具体地说,就是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的机理和脉络,把握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如果我们能够证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正在或者已经通过产业转移将中心区域扩展到了周边地区,那么,我们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以及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在中国乃至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就会有一个更高层面上的认识,对制定区域发展的政策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理论框架的构建

在区域经济发展或空间经济的理论分析中,最常见的分析方法就是二元结构的分析方法。比如在中国国内,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流行的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 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20世纪60年代,缪尔达尔(G. Myrdal)和赫希曼(A. O. Hirschman)借用增长极理论提出了一种应用性更强的“极化—扩散”(亦可称为“核心—外围”或“中心—边缘”)理论,将它应用于区域

这里所说的“中心区域”不是一般城市地理学中的“中心区域”概念,而是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以及空间经济学中的概念,是和“外围”或者“边缘”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不平衡增长问题的分析。1966年,弗里德曼(J. Friedmann)将其应用于对委内瑞拉经济的分析,建立了一个“中心—边缘”模型,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之后,这种“中心—边缘”或者“核心—外围”的二元结构的分析范式就成为区域经济学中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近年来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家们也基本延续了这种“中心—外围”的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进行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研究。1998年,藤田昌久等人将东亚经济发展的过程描绘成一个“集聚—扩散”的过程。比如藤田认为,在日本,以东京、横滨为中心的京滨经济圈和以大阪、京都和神户为中心的京神阪经济圈是日本经济的核心区,其他则是外围地区。在亚洲,起初日本是亚洲经济发展的核心区,以后这一核心区扩展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亚洲 NIES),并在进一步扩展中。

依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经济系统常常具有这样的倾向,即在相当长时期内,拥有一个或几个核心地区,以其为顶点,自组织化地形成多层空间结构。不难观察到,这些多层系统常常具有自我类似(fractal)的结构,即在众多不同空间层面上具有同样的结构,也即“核心—周边(core periphery)”型的空间结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曾经的周边地区会演化成为核心地区或者准核心地区,从而引起新的结构变化。我们可以将这种自组织化的多层空间结构简化成图 1 这样的结构:如在圈 和圈 组成的空间结构中,圈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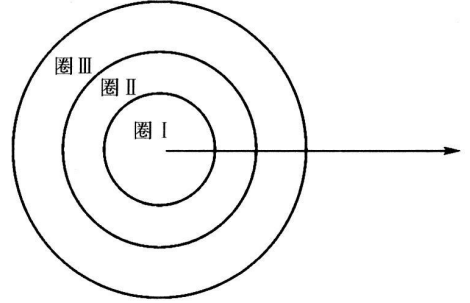


图 1 自组织化的多层空间结构

核心,而圈 是外围;在圈 、圈 、圈 组成的空间结构中,我们可以将圈 作为核心,将圈 和圈 作为外围,也可以将圈 、圈 作为核心,将圈 作为外围。在一个长时段中,随着经济的发展,核心区的周边地区如圈 地区,常常会演化成为核心地区或者准核心地区,从而引起新的结构变化。这个过程会不断地被复制,从而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如果着眼于一个特定的区域经济,经济发展长期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成长”和“衰退”以及与此相对应的“集聚”和“扩散”现象交替出现的过程。表现在产业发展上,这又是某个产业或产业群的“空洞化”,或者被新的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产业或产业群体所替代的产业经济现象交替出现的过程。特别是在区域经济系统全体处于成长过程的情况下,那些区域位置靠近核心区的边缘地区,如图 1 中的圈 地区开始作为“前沿(frontier economy)地带”进入经济增长的起飞阶段,这时,常常带来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的全面动员(massive mobilization),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呈现出波浪型的发展状态。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发展不但表现在经济总量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上,也表现在区域空间结构的动态演化过程上。

引起区域经济系统长期动态变化的因素包括外生和内生两种,主要有:(1)运输费用的减少;(2)制度的变革;(3)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新产品和新材料的开发;(4)人口的增加和人力资源的积累;(5)资本的积累;(6)信息和知识的积累,等等^[2-3]。

在新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产业区域转移实际上是区域经济集聚和扩散中的一个主要环节,是广义的运输费用变动后,原来集聚中心的土地和劳动必须更为集约地使用,差别化优势变小,运输费用较低的产品生产活动开始向周边地域集聚,如果运输费用进一步下降,产业和生产活动就会呈“雁行形态”从核心地区向周边地域顺次移动。

我们用图 2 来表明这种产业区域转移的“雁行形态”,并将其和图 1 表示的自组织化的空间结

[日]藤田昌久、久武昌人《日本和东亚地域经济系统的演变——新空间经济学视角分析》,载《通商产业研究所报告》,1998年6月。

构对应起来。

在图 2 中, 横轴为时间轴 T , Y 轴为某一产业(或产品, 我们设其为 C) 的产值或产量(可以用绝对值表示, 也可以用相对值表示, 如市场份额等)。我们可以看到在 $T_0 - T_1$ 期间, C 产业(品)在圈 I 地区经历了其发生、发展的过程, 在 $T_1 - T_2$ 时期进入了成熟和衰退的过程。而就在圈 I 地区 C 产业出现衰退期间, 即 $T_1 - T_2$ 期间, C 产业(品)开始在圈 II 地区崛起, 开始了在圈 II 地区的发生、发展过程, 这样, C 产业(品)在圈 I 地区和圈 II 地区先后继起的发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 我们称为产业区域转移, 即随着时间的推移, C 产业(品)的发展中心从圈 I 地区转移到了圈 II 地区。从图 2 看, C 产业(品)在圈 I 和圈 II 地区先后继起的发展就像先后起飞的大雁, 圈 I 地区是 C 产业(品)发展的头雁, 圈 II 地区是 C 产业(品)发展的第二只雁。与此相对应, 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也从圈 I 地区扩展到了圈 II 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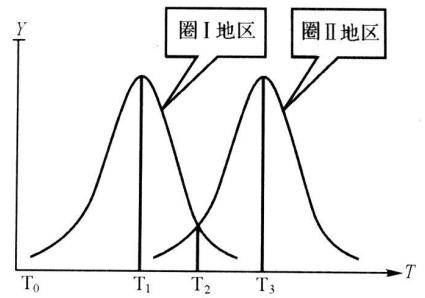


图 2 “雁行形态”示意图

三、上海—浙江间产业转移的判断机理

(一) 产业转移的概念和产业转移的发生

所谓产业转移, 主要指产业区域转移, 一般地说是由于资源供给或(和) 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以后, 某些产业从某一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的经济过程, 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促进区域间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4]2-3}。从新空间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产业转移是空间结构的自组织动态演化的一个关键环节, 是中心区域的扩散过程的表现。如何从宏观角度把握判断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发生, 可以用图 3 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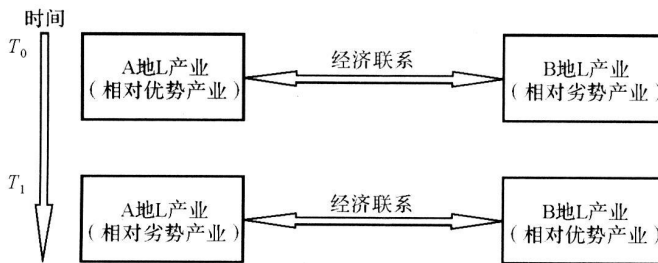


图 3 产业转移发生的机理

由图 3 可知, 如果在 T_0 时期, L 产业是 A 地的相对优势产业、 B 地的相对劣势产业, 但是经过了一个时期($T_0 - T_1$) 后, 到了 T_1 时期, L 产业在 A 地变成了相对劣势产业, 而在 B 地成为了相对优势产业。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在 A 、 B 两地之间出现了产业转移, L 产业的发展中心从 A 地转移到了 B 地。判断在 A 、 B 地区之间发生了产业转移最基本的条件是两地区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 这种经济联系的主要纽带是产品和要素的流动。在这里, 我们并没有把直接投资作为判断产业区域转移的条件, 也就是说, 即便在 A 、 B 两地区间没有发生可以观察到的直接投资, 我们依旧可以认为两地间发生了产业转移, 只要有了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 有了相对密集的产品和要素的流动, 产业区域转移就有可能发生。我们还可以将产业区域转移的判断条件进一步放宽。即, 在经过

$T_0 - T_1$ 时期后, A 地尽管依旧维持着 L 产业的相对优势, 但 A、B 两地之间在 L 产业上的优势差距已经大为缩小, 也就是说, 出现了 A 地 L 产业的区域竞争优势弱化, B 地 L 产业的区域竞争优势强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依旧可以判断在 A、B 之间发生了产业区域转移。

(二) 制造业重心的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总量占全国的份额在不断地上升, 1978 年, 长三角地区的 GDP 占全国总额的 18.7%, 2003 年上升到 23.9%。其中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更大, 1978 年, 长三角地区的工业比重为 22.7%, 2003 年达到了 29.0%, 人均工业产值是全国平均值的 2.5 倍强。但另一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曾经是长三角地区工业的重心, 因而也是中国工业经济中心之一的上海工业, 在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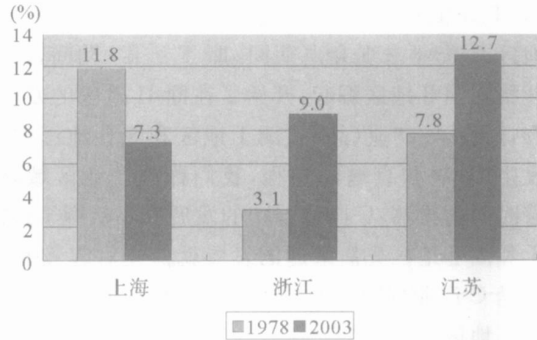


图 4 长三角地区各省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地位

国的地位实际上是下降的, 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11.8%, 下降到 2003 年的 7.3%。而浙江和江苏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却有明显的上升, 分别从 1978 年的 3.1% 和 7.8%, 上升到 2003 年的 9.0% 和 12.7% (见图 4)。

表 1 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

		1978 (%)	1990 (%)	2003 (%)
上海	第一产业	4.0	4.3	1.5
	第二产业	77.4	63.8	50.1
	第三产业	18.6	31.9	48.4
浙江	第一产业	38.1	25.1	7.7
	第二产业	43.2	48.9	52.6
	第三产业	18.7	26.0	39.7
江苏	第一产业	27.6	26.9	8.9
	第二产业	52.6	48.6	54.5
	第三产业	19.8	24.5	36.6

资料来源: 浙江省统计局编《浙江统计年鉴》(2004),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年版; 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统计年鉴》(2004),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年版; 江苏省统计局编《江苏统计年鉴》(2004),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年版。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上海就开始显现出向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过渡的经济发展特征, 表现在三大产业的构成中, 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如表 1 所示, 从 1978 年到 1990 年, 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从 77.4% 下降到 63.8%, 12 年间下降了 13.6 个百分点, 之后下降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到 2003 年, 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到了 50.1%, 较之 1990 年, 13 年间又减少了

长三角地区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 狭义为上海和江苏南部与中部 8 城市以及浙江东部与北部 7 城市, 共计 16 城市; 广义的包括江浙沪二省一市。本文侧重于理论分析, 如果没有说明, 基本上以江浙沪为长三角的分析范围。

13.7 个百分点。而同一时期, 上海的第三产业增加了 29.8 个百分点, 从 1978 年的 18.6% 增加到 2003 年的 48.4%。与此相对应, 浙江和江苏 2003 年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比上海高, 分别达到了 52.6% 和 54.5%, 较之 1990 年分别增加了 3.7 和 5.9 个百分点。从绝对值的比较也可以看出, 2003 年浙江的工业产值(规模以上企业部分) 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9.0%, 江苏的工业产值(规模以上企业部分) 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12.7%, 而同期上海仅为 7.3%。无论是江苏还是浙江, 工业总产值的绝对值都超过了上海,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 上海的工业生产总产值比浙江、江苏的总和还要多。

四、产业转移评估模型的构建及其测算

为了证实长三角内部存在的从上海到周边地区(浙江、江苏)的产业转移的存在, 我们构建了区域产业竞争力系数模型来测算和评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制造业各产业(行业部门)之间的产业转移的动态趋势。

1. 区域产业竞争力系数模型的构建思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一个地区的区域竞争优势可以用这个地区的产品对区域外市场的覆盖程度来表示, 也就是说, 这个地区输出的产品越多, 其输出产品在全国总需求中所占的份额越大, 就表明这一地区的区域竞争力越强。但现实的问题是, 一个国家的产品竞争力可以由进出口水平来衡量, 而一个区域的产品(产业)竞争力如果要用“进出口”水平来衡量, 就有许多困难。因为一个地区的出口(输出)和进口(输入)很难进行统计, 不论国内外都是这样, 因此, 必须采用另外的评价手段。我们从产业专业化系数(或区位商: LQ)的建构机理中获得启发, 从供给的专业化或者生产的专业化角度来判断区域产品对全国市场的覆盖程度, 进而构建起一个名为区域产业(产品)竞争力系数模型, 以评估产业转移的动态过程。

2. 假定条件。在构建区域产业竞争力系数模型测算各地区产业竞争力时, 我们基于以下假定条件: (1) 全国各区域对所有产品的需求都是均匀分布的, 表现为各区域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一致性; (2) 消费品的质量差异已经体现在价格和产值中; (3) 产出等于需求; (4) 全国市场是一个封闭的市场, 进出口数量为零。

3. 区域产业竞争力系数模型的构建。在满足以上假定条件的情况下, 全国的人均 i 产业(品)

需求是: $q_i = \frac{\sum_{j=1}^{31} Q_{ij}}{\sum_{j=1}^{31} L_j}$, 式中 Q_{ij} 表示 j 地区的 i 产业的产出; L_j 表示 j 地区的人口; $\sum_{j=1}^{31} Q_{ij}$ 表示全国

i 产业的产出; $\sum_{j=1}^{31} L_j$ 表示全国人口。而 j 地区的 i 产业(品)的实际人均产出 Y_{ij} 可用下式求得:

$Y_{ij} = \frac{Q_{ij}}{L_j}$ 。 j 地区 i 产业的(输出)产值可由下式求得: 人均输出: $X_{ij} = (Y_{ij} - q_i)$; 地区 i 产业的总输

出: $N_{ij} = (Y_{ij} - q_i)L_j = \left[\frac{Q_{ij}}{L_j} - \frac{\sum_{j=1}^{31} Q_{ij}}{\sum_{j=1}^{31} L_j} \right] L_j$ 。这样, j 地区的 i 产业(品)的产业(品)竞争力系数就

可由以下算式求得:

$$R_{ij} = \frac{(Y_{ij} - q_i)L_j}{\sum_{j=1}^{31} Q_{ij}} = \left[\frac{Q_{ij}}{L_j} - \frac{\sum_{j=1}^{31} Q_{ij}}{\sum_{j=1}^{31} L_j} \right] \frac{L_j}{\sum_{j=1}^{31} Q_{ij}}$$

产业(品)竞争力系数表明的是 j 地区 i 产业的输出额(在其他地区的销售额)占全国 i 产业总产值的比重, 或者说是 j 地区 i 产业的输出额占国内市场的份额。

4 测算过程及其结果。测算过程: (1) 我们在有关第二产业(工业)的分析中, 剔除了建筑业、采掘业和基本上服务于本地的基础产业, 如电力、城市煤气、供水、供热等, 选择了制造业中的 25 个主要产业。由于 2003 年对 1990 年的工业部门的分类有所调整, 对此也做了一些技术处理。(2) 以 1990 年和 2003 为测算年度, 分别测算了这两个代表年上海和浙江的 25 个制造业产业的产业竞争力系数。测算结果及其分析表明: 以产业竞争力系数作为区域竞争优势的标志性指标, 只要某区域的产业竞争力系数大于零, 就可以认为该地区该产业具有输出竞争力。输出竞争力越大, 产业竞争力也越大, 详见表 2。图 5、图 6 更直观地反映了我们的测算结果。现将浙江和上海 1990 年到 2003 年的产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分析整理如下:

表 2 上海和浙江制造业竞争力系数的动态比较

	上海 1990	浙江 1990	比较优 势地区	上海 2003	浙江 2003	比较优 势地区
食品制造业	2.88	1.06	沪	6.09	4.96	沪
饮料制造业	2.24	3.74	浙	2.28	8.97	浙
烟草加工业	3.57	- 1.03	沪	5.95	5.38	沪
纺织业	7.53	7.57	浙	2.29	22.66	浙
缝纫业	9.34	4.55	沪	6.83	21.42	浙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6.31	6.17	沪	2.59	24.28	浙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4.14	1.84	沪	5.86	12.11	浙
家具制造业	3.11	1.84	沪	5.72	11.90	浙
造纸及纸制品业	4.88	2.44	沪	2.26	12.01	浙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6.91	1.57	沪	7.79	10.54	浙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25.51	3.54	沪	9.72	15.67	浙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4.34	- 0.39	沪	7.04	5.03	沪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0.63	9.39	沪	4.87	7.29	浙
医药制造业	6.66	0.83	沪	4.74	9.61	浙
化学纤维制造业	18.22	2.01	沪	2.58	25.79	浙
橡胶制品业	9.50	1.08	沪	5.79	8.72	浙
塑料制品业	5.60	7.23	浙	5.74	15.88	浙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2.48	2.41	沪	2.65	7.02	浙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2.33	- 1.98	沪	6.65	2.60	沪
金属制品业	8.72	3.26	沪	8.03	13.13	浙
普通机械制造业	9.36	1.76	沪	10.99	14.86	浙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9.09	- 0.88	沪	12.80	6.56	沪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9.49	3.16	沪	6.27	13.89	浙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1.54	0.72	沪	10.89	4.10	沪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3.31	4.64	沪	9.39	10.84	浙

资料来源: 根据《浙江统计年鉴》(1991、2004)及《上海统计年鉴》(1991、2004)整理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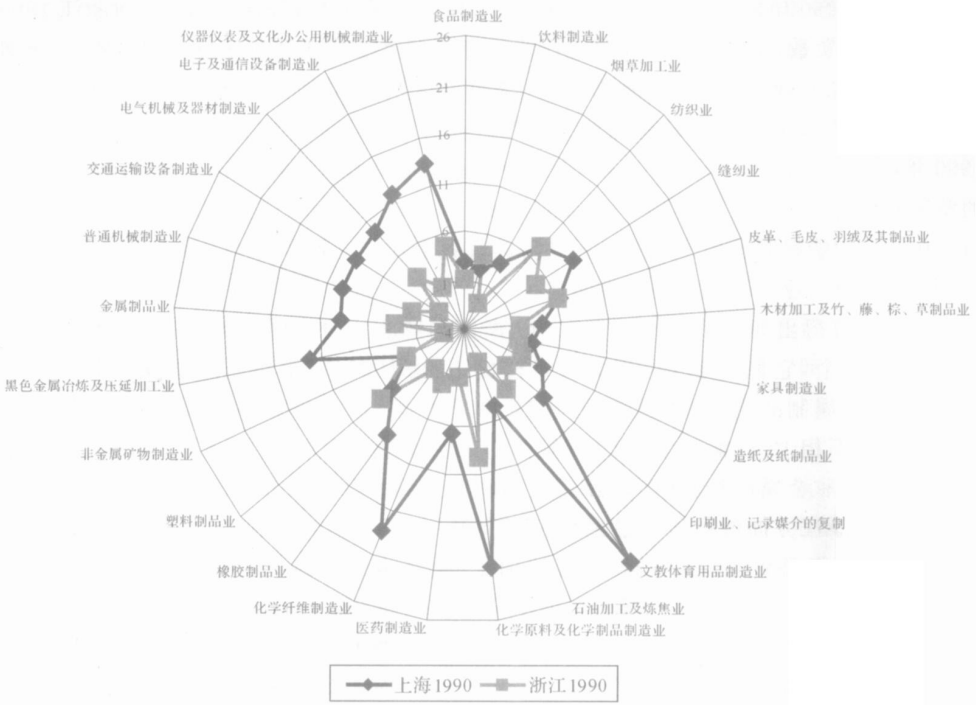


图 5 上海和浙江的制造业竞争力系数比较(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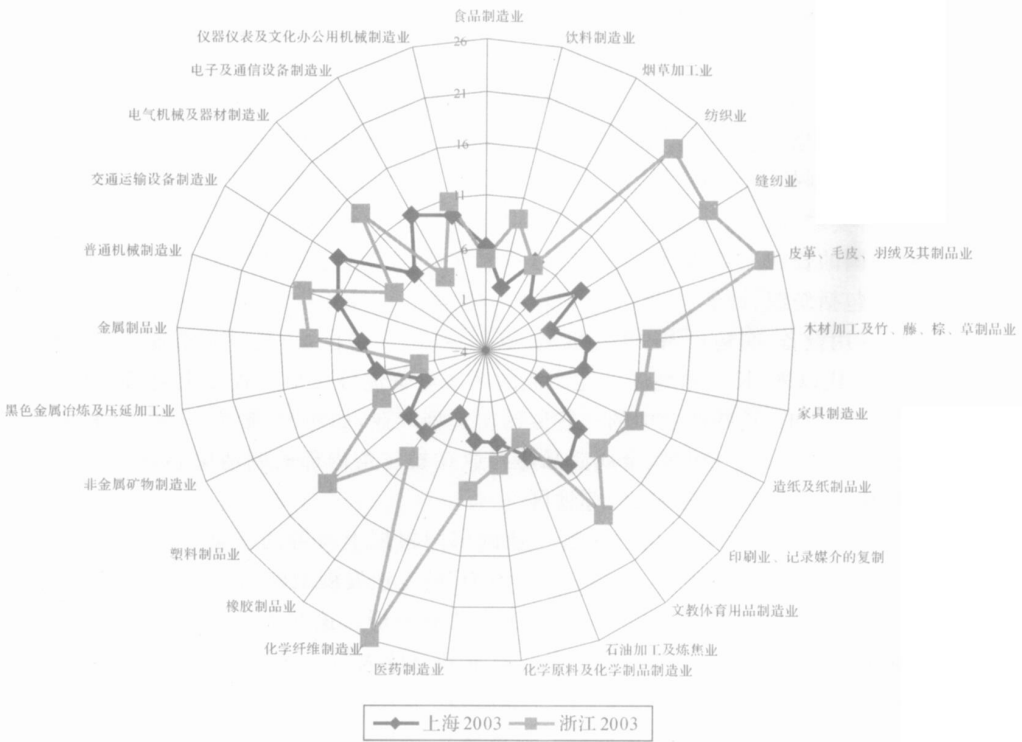


图 6 上海和浙江的制造业竞争力系数比较(2003年)

上海无论在 1990 年还是 2003 年,其制造业的 25 个产业都具有输出竞争力,而浙江 1990 年有 4 个产业竞争力是负数,也就是说浙江这些产业的产值甚至不能满足浙江自身的需要,要从外部输入,它们是:烟草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黑色金属冶炼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但是,到了 2003 年列入测算的浙江的 25 个产业都转为输出产业。

1990 年,在列入比较的 25 个产业中,上海对浙江具有产业竞争优势的有 20 个产业,还有 3 个产业的竞争力和浙江不相上下(竞争力系数差距在 ± 0.5 以内),他们是纺织、皮革、非金属矿物;而浙江只有在饮料和塑料制品两个产业上对上海具有竞争优势。到 2003 年,浙江对上海的优势产业达到 19 个,制造业产业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

进一步分析可得出如下结果:(1) 1990 年,浙江的产业竞争力明显低于上海,而 2003 年高于上海的产业有 14 个,它们是服装(缝纫)、木材加工、家具制造、造纸、印刷、文教用品、化学、医药、化纤、橡胶、金属制品、普通机械、电气机械、仪器仪表;(2) 1990 年浙江和上海的比较,浙江具有优势或两者不相上下,而到 2003 年,浙江的优势有明显扩大的产业达 5 个,即饮料、纺织、皮革、塑料制品和非金属矿物,其中,纺织、皮革和非金属矿物的竞争力 1990 年上海和浙江不相上下,到 2003 年浙江方面的竞争力已经数倍于上海;(3) 2003 年,上海依旧对浙江保持竞争优势的有 6 个产业,它们是食品、烟草加工、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冶炼、交通运输设备和电子通信设备。可见,上海在都市工业(食品、烟草)、上游原材料工业(石油加工和钢铁)、汽车和船舶制造和以电子通信设备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依旧具有优势;(4) 比较 1990 年和 2003 年,上海在以下行业的输出竞争力上尽管不及浙江,但是依旧呈平稳增长态势,它们是:饮料、木材加工、家具制造、印刷业、塑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建筑材料)和普通机械,这些产业基本和都市居民的居家生活有关;(5) 上海和浙江的化学产业从 1990 年到 2003 年输出竞争力都是下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环境条件的制约,只是上海比浙江下降得更快。因此,在这个产业上浙江获得了对上海的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1990 年到 2003 年间,在上海和浙江之间发生比较明显的产业区域转移的产业共有 17 个,它们是:纺织、服装(缝纫)、皮革、木材加工、家具制造、造纸、印刷、文教用品、医药、化纤、橡胶、非金属矿物、金属制品、普通机械、电气机械、仪器仪表;它们共同的特征是:上海在这些产业上的输出竞争力相对萎缩,而浙江在这些产业的输出竞争力上明显提高。

一般认为,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产业主要是以非农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重化工业,包括纺织、服装、皮毛羽绒(皮革)、化学工业、化学纤维、橡胶制品、钢铁工业、金属制品、普通机械、专用设备、交运设备、电气机械、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其他制造业^{[5]300}。而本研究表明,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上述产业的区域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长江三角洲内部的产业转移来维持的,这些产业中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皮革、文教用品、化学纤维、橡胶制品、普通机械、电气机械、金属制品等产业在长三角内部的制造中心,已经从上海转移到了或者正在转移到上海周边的浙江、江苏地区。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上海地方政府主管工业的部门根据上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不断弱化的现实状况,制定了一个“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工业发展战略,将一些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定位于“有所不为”产业,决定放弃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等与上海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周边地区发展同类产业打开了产业转移的大门。这些被上海认定为“有所不为”的产业或产品,几乎都是浙江制造业的强势产业和产品^[6]。

当然,不能据此认为,上海和浙江之间的产业转移只是上海有关部门和企业的自觉行为,就像国际上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区域转移那样。事实上,这是一个互动行为的结果:首先,由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随之而来的上海和长三角地区(江

浙地区) 之间在微观层面上广泛进行的技术经济合作(上海的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之间) 使得上海丧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竞争优势, 也就是说, 在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 长三角地区产业经济的增长发动机事实上已经转移到了江苏和浙江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 上海有关方面对此作出的战略调整是对这种既成事实的追加承认, 有助于促进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推进, 也有助于产业转移的进一步深入。

五、空间结构的演化

以上研究表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在长三角内部出现了从上海向以浙江为代表的周边地区的产业区域转移。这种产业转移的结果, 导致了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 指传统制造业发展重心从上海转移到了周边的浙江和江苏地区; 空间结构的变化, 指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 或者说长三角内部的地区收入水平趋于“匀质化”, 而长三角地区和周边的安徽、江西等地区的发展差距依旧较大。以浙江作为上海周边地区的代表, 以安徽作为长三角周边地区的代表, 由图 7 可知, 如果以上海的人均 GDP 为 100%, 那么, 1980 年, 浙江是 17.2%, 安徽是 10.6%; 到 1990 年, 浙江上升到了 35.9%, 安徽上升到了 20.0%; 到 2003 年, 浙江进一步上升到 43.1%, 浙江北部和东北部, 即长三角 16 市中浙江 7 市的人均 GDP 达到 56.7%, 而安徽则为 13.8%。如果以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衡量, 2004 年长三角 16 市中的浙江 7 市和江苏 8 市分别达到上海的 88.8% 和 70.3%。另一方面, 安徽和上海之间的发展差距则依旧徘徊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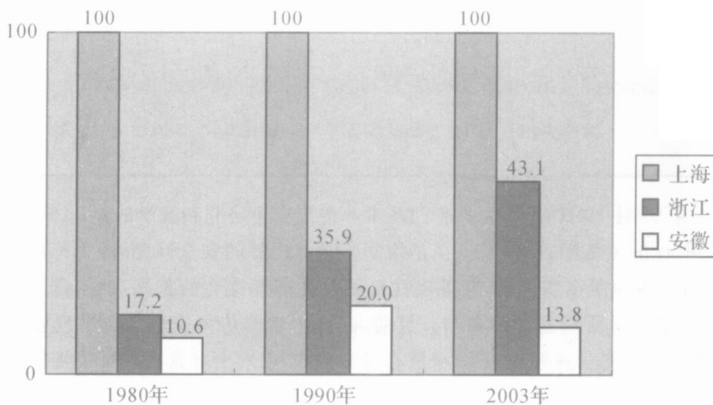


图 7 长三角及其周边地区空间结构的演变(以人均 GDP 比值的变化为标志)

根据新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长三角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以产业转移为载体的“集聚-扩散”演化过程, 表现在以上海为核心的中心区域的向外扩张。如果我们将上海、上海周边(以浙江为代表)、长三角周边(以安徽为代表) 抽象成一个如图 1 所示的自组织化的多层空间结构, 不难发现,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这一空间结构的主要“中心-外围”体系是“上海-上海周边+长三角周边”; 而到了 2003 年, 这一空间结构的主要“中心-外围”体系演变成了“上海+上海周边-长三角周边”, 或者说“长三角-长三角周边地区”。

有关统计数据可参见浙江统计信息网。

[参 考 文 献]

- [1] 陈建军, 姚先国. 论上海和浙江的区域经济关系——一个关于“中心- 边缘”理论和“极化- 扩散”效应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 2003, (5): 28- 33. [Chen Jianjun, Yao Xianguo. On Reg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Shanghai and Zhejiang Provinc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ore Periphery” Theory and “Polarized Spread” Effect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 Research, 2003, (5): 28- 33.]
- [2] Fujita, M., Tabuchi, T. Regional Growth in Postwar Japan[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7, 27: 643- 670.
- [3] Fujita, M., Krugman, P., Mori, T. 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 209- 251.
- [4] 陈建军. 产业区域转移与东扩西进战略——理论与实证分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Chen Jianjun. Strategies for Shifting Industrial Areas and Expanding the East and Developing the West: Theory and Demonstration[M]. Beijing: Zhonghua Books Co., 2002.]
- [5] 程选. 我国地区比较优势研究[M].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1. [Cheng Xuan. Researches on and Comparing of Regional Advantages in China[M]. Beijing: China Planning Press, 2001.]
- [6] 陈建军, 姚先国. 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经济关系研究——以浙沪经济关系为例 [J]. 管理世界, 2003, (5): 44- 51. [Chen Jianjun, Yao Xianguo. A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Building of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enter in Shanghai and Industrial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Case of Econo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Shanghai and Zhejiang[J]. Management World, 2003, (5): 44- 51.]

本刊讯: 2006年11月30日, 国内首家专门从事非传统安全研究和教学的基地——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非传统安全是指军事领域之外的安全问题, 涵盖环境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安全等诸多领域, 其重要性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如何研究和解决系统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吸引了各学科专家们的参与。目前,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已有来自理、工、农、医、经、管、法、文各学科领域的13个核心研究团队, 近六十名成员。同时拥有来自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以及欧盟等世界组织的专家学者组成的顾问团队。中心将以矩阵相交的方式开展学科的交叉与研究, 在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议题上组合不同学科专家进行协同式探索, 研究领域包括安全哲学、能源与国家安全、材料与国家安全、食品与安全、社会公共危机、文化传播与安全、企业安全等。在各专家原学科研究的基础上, 增加安全研究的价值维度, 继而在交叉基础上, 通过仿真研究, 对国家发展的体制建设与综合发展咨询提出国策建议。成立仪式后还举行了以“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为主题的西湖论坛, 来自理、工、农、医、文等学科的一些专家学者及企业界人士与会并进行了热烈讨论。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胡建森教授参加了此次会议。